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本期白夏在概述法國知識份子的歷史與現狀時，感慨自1980年代以後，法國的公共領域式微和公共知識份子普遍失語。在籌劃「二十一世紀評論」這一公共話題的專欄時，本刊編者深感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知識界也出現同樣狀況，而且日趨嚴重。如果說，公共知識份子的標準是遵循內心的道德準則對關係到公共利益的問題反思和發表批評意見，那麼，在政治、經濟、民生、文化和生態等問題叢生的新世紀，為甚麼中國知識份子反而沒話可說了呢？針對這種現狀，難道是「無奈」兩個字就能交代的嗎？

——編者

民族國家與大學理念

貴刊2003年12月號刊登羅崗先生〈危急時刻的大學精神——重識蔡元培的大學理念〉一文，切入到民族國家與自由理念的緊張衝突這個現代性的深層困境中，在這二者的張力關係中審視現代大學理念，而不是泛泛而談所謂「學

術自由」、「教授治校」，讀畢頗受啟發。

現代民族國家是隨着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而產生和壯大起來的。作為歐洲後發國家的德意志，其「民族性」的體驗尤為強烈。十八、十九世紀德國產生的一大批文化巨匠，亦都打上了民族精神擔綱者的烙印。然而，在民族精神與自由理念兩者皆十分匱乏的時候，似乎可以相得益彰，但是隨着其深入開展，則必會產生嚴重矛盾。在德國這樣的政府主導現代化的國家，脆弱的自由理念更是難敵強大的民族精神訴求。隨着德國經濟軍事實力的壯大，自由理念迅速凋零，「法西斯化」難以避免。德國的大學連胡塞爾、愛因斯坦這樣的大師都不能容，所謂「大學理念」、「學術自由」已成欺人之談。為當今中國學界津津樂道的蔡元培的大學理念，與洪堡特的大學理念有重要的傳承關係及相似之處。這當然有其現實原因，即近現代中國作為一個後發國家與十八、十九世紀的德意志有十分相似之處，所以德國的哲學文化極易引起中國學人的共鳴。

聯想到近來中國學界有關

大學理念的討論，我感到，雖然民族國家仍是我們目前國家形態的基本形式，而那些所謂創建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結束中國的留學運動的亢奮之論，也着實值得我們警惕。羅文中引愛薛培爵士的話值得我們深思：「牛津的忠誠不再屬於英國國教教會，甚至也不僅僅屬於英國的學術體系，而是屬於整個的從中國到秘魯的大學的星群。」

孫樂濤 湘潭

2003.12.28

神五升空意義何在？

貴刊2003年12月號的陳方正先生〈動於九天之上的飛龍——神舟五號意味着甚麼？〉一文，參考材料不過中外科普雜誌，但卻能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估量意義，揣測前景，並用《周易》術語為讀者拆解了一套神五升空的「降龍十八掌」套路，的確別開生面。

神五升空後，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封面大書「恭喜」(Congratulations!)二字，下面緊跟着調侃了一句：「所以，不再需要援助了吧？」這裏隱含的邏輯是，貴國都富到有錢送人上天，也該不缺銀子讓地面的百姓奔小康了。在《經濟學人》作者的治國思維裏，文治應是優先於武功的。不過放到中國這種「發展中大國」的語境下，其實面臨的還是「大炮與黃油」之間的權衡取捨。「發展中」要求更多的

黃油，但「大國」要求中國不能借助其他強權，而要靠自己的武力保證和拓展其利益。用陳先生的話說，「人活着，不是單靠麵包。」《經濟學人》和中國領導人算的本是兩本帳。

由於都表現了「人類向無盡穹蒼飛昇的深層願望，都包含極強的科技因素」，陳先生將中國發射神五與古埃及建金字塔和中古西歐建大教堂相類比，這種比較是否恰當還值得商榷。金字塔與大教堂均是基於某種宗教信仰而建造的，兩者背後的「天國」與神五射入的「太空」並非一物，而相應的建築技術與具有戰略意義的航天技術恐怕也不可等量齊觀。如果硬要比附，倒不妨和十四至十八世紀西歐的航海大業作個比較。當時的大西洋、太平洋正如今日之地外空間，而從西班牙到不列顛諸國的百舸之流，也像極了當代美俄兩國的太空競技。

這就牽涉到陳先生所討論的下一個關節：神五升空意義何在？就美俄兩國多年鬥法來看，似乎正如當年的哥倫布船長，所費不貲，意義重大，功載史冊，但當下可沒有撈到多少實惠。以至陳先生不由得對神五項目下了「凌虛蹈空，以實就虛之舉」的結論。筆者近日閒翻《世界探險史》，書中故事之風險波折，當事人根本無法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如若困守原地，結果必然為陳先生所說的望洋興嘆的「在田」局面。假如地外空間果真是二十一世紀的新大陸，則國人不應

再錯過這一歷史機遇，在諸強之中佔據一席之地，方不愧為「龍的傳人」。

田方萌 北京
2003.12.30

從立憲者的理念講起

蕭濱的〈美國制憲者心目中的個人、社會與國家〉(2003年12月號)一文，從立憲者個人的角度探索憲法思想和內涵，對當代中國的立憲路徑選擇及憲政實施具有重要意義。

該文還從另一個角度闡明：人類能夠通過國家公共權力的力量，來維繫社會的秩序，使社會以及人類能夠在一種秩序的框架內生存下去，這是人類政治文明發端的一個重要標誌。

普布利烏斯的個人、社會和國家理念多層面的研究，使得我們思考下列關鍵問題：政治發展的外部環境在政治文明建設中起着怎樣的作用；人類如何通過科學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技術設計，提高非暴力狀態下解決政治矛盾和衝突的有效性；如何使得所有社會成員在一種文明祥和的政治狀態下互愛互信，共榮共存。人類政治生活以及未來美好政治生活的理想有共同性，這是借鑑人類一切有益文明成果以推進一國政治建設的基礎。即使是一些注意到政治文明建設中生態環境因素的思想家，也並沒有否認政治借鑑的可能性，普布利烏斯的理念則為中國的制度建設提供了可貴的借鑑。

趙銀亮 鄭州
2003.12.29

如何討論政府的大小與好壞？

許多人都是拘泥於中共一黨集權體制內來討論「政府的大小」，然而，秦暉先生的〈權力、責任與憲政：兼論轉軌中政府的大小問題〉(2003年12月號)啟發我們跳出體制的鐵籠子，去討論「大小政府」的問題。

他指出，不能撇開權利和責任去抽象地談論政府的大與小，否則只會陷入一種無謂的爭論以及對美國立國者思想的誤讀和曲解。人們最期盼的理想政府應該是一個「權力最小而責任最大的政府」，即從限制公民自由來說是「小」，從提供公共服務來說是「大」的政府。然而，我們生活其中的這個政府又是一種甚麼樣的情況呢？它提供給我們的「服務」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一種對權力的變相使用上。正如秦文中所提及，北京倡導的「義務教育」，在習慣了攬權和發號施令的政府體制下，最終淪為一種對沒有經濟能力送自己子女上學的父母之強制與示眾，即對人身公民權利和尊嚴的侵害。

另外，衡量政府的好壞也沒有固定標準，關鍵在於有沒有憲政民主的保障。真正的憲政民主政府會根據公共利益的需要，適時調整其權力和應向社會承擔的義務與責任。只有在憲政條件下，思想家對大小政府的討論才有意義。相反，沒有憲政民主做基礎的政府，其(權)大只會產生秦始皇，其(責)小也更不會孕育出里根和撒切爾。

靈山 北京
2003.12.29